

习近平执政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对印外交实践

涂波 新罗大学

内容提要

中国进入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的3.0版外交时期后，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尤其是2017年以来，3.0版中国外交政策继续有新的变化：一是强调了“周边外交方针”，并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一带一路”写进了《党章》；二是在《宪法》里增加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除此之外，“亚洲新安全观”和“底线思维”等新的理念也逐渐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不断得到落实。在风云多变的国际社会里，不断有反全球化和反区域一体化的逆流出现，莫迪政府领导的印度就是一个例子。莫迪极力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不仅在印度境内掀起了一轮又一轮宗教民族主义思潮，而且还外溢到了国际社会。尤其印度军方分别两次越境进入中国，制造了洞朗事件和加勒万河谷冲突，严重影响了中印两国关系，也给3.0版中国外交政策造成了严峻考验。本文着力研究了3.0版外交政策发展时期的重要理念是如何运用到对印度的外交博弈里，又是怎样既避免事态升级，又不卑不亢合理发声的。从结果上看，中国在洞朗事件上保持了高度克制，坚持通过谈判协商解决问题；在两次事件的中间期，中国积极推动首脑互动，努力寻求打造和平互利共赢的态势；而在加勒万河谷冲突时期，中国在坚持“底线思维”的同时，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在今后，中国仍然需要坚持“新型大国关系”、“底线思维”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等3.0版外交理念，在维护好中国核心利益的同时，尽力创造和维护良好的周边外交环境，以此来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中国，3.0版外交政策，印度，外交实践，莫迪政府

I. 前言

中国自建国以来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外交基础。在邓小平成为共产党第二代领导核心以后，中国实施了对外开放战略，并逐渐确立了“不结盟”的外交原则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外交实现了从“革命外交”到“建设外交”的转型。自进入21世纪以来，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国内外环境继续发生变化：一方面，全球霸主之美国意识到了中国的崛起将是其在亚洲面临的重要地缘战略威胁，因此奥巴马美国政府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亚太，并针对中国采取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而新任总统特朗普则试图构筑新的“印太战略”来牵制中国的“东进”，并在2020年以来逐渐采取了竞争和对抗为主调的战略。另一方面，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来“西出”，同时奉行“亲诚惠容理念”、“以邻为善、以邻为伴”和“底线思维”，等周边外交方针。对此，有学者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的新型外交时期看做继毛泽东时期的1.0版外交政策和邓小平2.0版后的3.0版外交。在此时期，周边外交占有非常重要的特殊地位，维护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对于中国延续成功崛起之路，继续推进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理念的“西出”，以及推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至关重要；同时，在3.0版外交政策中如何处理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也是一个重点和难点。如对于东北亚地区，中国政府一直呼吁和平和无核化，助力韩半岛的和平局势，以及推动核问题各利益方实现对话协商，中国一贯主张的推动对话和协商来寻找和平发展起到了推动局势缓和的作用，中国为韩半岛的稳定做出了贡献。在南亚地区，中国3.0外交政策继续展开，但是在对印度的外交则遇到了不少的阻碍。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两国都非常重要，但是印度的莫迪政府为了获取更多印度教族群的支持来得到政治利益，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崛起的激进政策，使得印度国内各宗教和民族的矛盾激

化，社会问题严重。在此情况下，莫迪政府为了转移印度民众的视线，对周边的一些国家采取了“外交炒作”，其中一直以来视为是“敌国”的巴基斯坦成为被印度攻击的首要对象，而中国也成为了莫迪政府外交攻击的新对象。莫迪政府分别在两次任期内，在洞朗和加勒万河谷地区分别挑起边境事件和边境冲突，这给中印关系带来重大影响，也给中国继续开展周边外交工作带来很大难度。那么，中国面对处理印度在边境地区的突发挑衅时，是如何坚持3.0版外交政策的有关基本理念的呢，又是如何在避免事态升级前提下维护中国正当权利的？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发现，学界主要是运用各种理论对霸权国和崛起国、以及国与国间的对冲博弈进行研究，而对于周边国家的外交博弈提及的并不多，而尤其对于结合中国3.0版外交政策和中印博弈具体事件而开展的研究还比较欠缺。本研究将使用文献分析的方法，以中国3.0外交政策在中印冲突事件的实践运用为主线，首先对学术界的文献进行整理并分析不足，其次阐述3.0外交政策的发展和中印边境冲突，再次分析3.0外交政策对印度的实践运用，最后提出结论。

II. 中国外交政策的文献回顾

为了回顾中国外交政策的相关文献，本文将从国际社会的外交博弈理论回顾，以及中印关系及其发展两个层面进行整理。对于各国利用外交政策来在国际社会进行博弈，各国的学者有着丰富的相关研究成果，也逐渐形成了一些理论系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权力转移理论、对冲理论和网络权力理论等。

20世纪50年代美国密执安大学的奥根斯基教授开创了权力转移理论，此后不断得到补充完善。随着苏联解体和中國崛起，以美国霸权为主导的西方体系热衷于把美国霸权的衰退和中国联系起来，宣扬“中国威胁”。某些西方学者惯用“修昔底斯陷阱”的思维模式来考量中国的崛起，如Graham Allison (2017)认为修昔底斯陷阱是最能用来帮助理解中美关系的理论。有学者针对国际社会的权力移动，认为世界已进入一个新的、

令人不安的地缘政治阶段，世界的主要大国可能会为了汇聚更大的全力而向某些规范和制度靠拢。这带来了军事、经济等方面新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造成国际关系多变和各国国内政治状况之间的不稳定 (Mike Segar 2020)。亦有学者指出，权力转移或预期的权力转移会导致战争，事实上权力转移是对战争最普遍、最受追捧的解释之一。它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修昔底德(Thucydides)，他认为雅典人权力的增长，以及其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 (Mark Souva 2017)。另外还有 Asle Toje (2018) 分析了中国的崛起是否将是和平的崛起等等。除了西方学界，许多亚洲学者也运用权力转移理论为基础来分析大国政治和中小国的应对，如Kang Kunhyung · Kang Byeongcheol (2016) 在中国崛起和中美关系变化的背景下分析了韩国的对应战略，Lee Jaebong (2014) 分析了美国对中国政策变化和韩国的中立外交等等。

而对冲战略主要用来描述国家之间为了降低本国风险或损失而对对方国家采取的某种战略，对冲意味着一个国家将融合接触与制衡，并同时为目标实施两种政策，从而获取本国的最大利益。余正探 (2007) 指出美国对中国实施了两面下注的对冲战略，一方面深化融合的政策，另一方面则采取新的大国结盟战略来对中国进行围堵并化解中国崛起对其产生的负面影响。Steven J. Smith (2012) 认为美国针对中国崛起而采取的“介入而对冲”的战略是美国在当时能够采取的最为谨慎而有效的战略。中国同美国的相互制衡或博弈形成了亚洲地区的基本格局，在这个大格局下亚洲各国也广泛使用了对冲战略，除了俄罗斯加强同中国的政治经济联系来对冲欧美的封锁之外，印度对中国的对冲战略也比较具有典型性。Soohyung Lee (2011) 以桥梁战略和对冲战略分析中轴中坚国和韩国的新外交安保战略等等。

此外还有学者运用网络权力理论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着力考量各个国家 (即节点) 相互间的作用。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有Freeman (1977) 在图论 (Graph Theory) 里研究了网络里节点的各种特性。Castells (1996) 通过对情报化时代、经济活跃的社会变化等精辟分析提出了社会将变得更加网络化，这推动了网络权力理论在各个政治经济领域广泛的运用和完

善。网络权力理论此后发展到对中坚国家利用网络权力的外交战略研究，尤其在近年来注意分析中小国利用节点的三种能力(对网络平台进行设计的能力，对不同的网络进行连接、中介的能力，以及扩张网络的能力)来构筑国际网络并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以上这三种理论各有千秋，权力转移理论主要是对霸权国和崛起国间的博弈进行演绎，而对冲理论则主要强调中坚国家或者中小国家对大国的博弈进行分析，网络权力理论也比较集中于对中坚国家在国际社会通过网络实施连接，并获得权力的研究。但网络权力理论对于大国是如何化解周边国家的非常规挑衅行为这方面还存在缺陷，有待进一步完善。

中印两国作为亚洲乃至全球性大国，两国的关系在国际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时好时坏的历史局面，而在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大体呈现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研究中印关系的文献较多，大多是对于中印两国在国家战略层面的相互影响及关于区域合作领域等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如杨思灵(2012)分析了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的战略合作并阐述了其影响，张立(2012)归纳总结了印度东向战略的进展、对中国的影响提出了应对战略，林民旺(2016)分析了中印发展在对接方面的各种问题，赵江林(2013)指出了中国和印度的双边经济关系不足以支撑两国新兴大国关系的发展，有必要加大政策挑战力度，文富德和徐菲(2016)指出印度能为“一带一路”提供诸多重要的机遇，但是也可能构成一些严峻挑战等等。另外还有学者特别关注分析了印度进入莫迪政府后的相关政策对于中国在南亚开展合作的影响，其中一些文章已经预见到了中印两国的关系发展并不会一帆风顺，可能会不断产生变数，如王晓文(2017)就评价印度莫迪政府的大国战略中制衡中国的筹码加重，地缘政治碰撞凸显。这些文献对于中印关系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也提出了一些有预见性的意见，对后续研究指明了重要方向。

从上面的文献整理可以看出，以上基于理论背景的外交博弈，和对中印关系的追踪分析，丰富了外交政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文献参考资料。然而，不管外交博弈的各种理论，还是对于中印关系的文献，它们对于中国在新时期如何把新的外交政策实践运用到中印关系，

如何处理印度非常规的攻击性外交手段方面缺乏合理的解释，尚需得到补充完善。本文将结合中国3.0外交的对印实践，从国际关系视角来对两国间的热点事件进行分析，将使得当前的理论体系得到一定补充和完善。

Ⅲ. 3.0外交政策的新发展和中印边境冲突

从1949年中国建国到70年代末，毛泽东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战略方针（王红续 2011），并确定了贯穿“独立自主”理念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中国建国到70年代末，中国采取的自给自足的计划经济发展方式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暴露出来了严重缺点，没有摆脱以意识形态来画线的原则（王存刚 2012）。自邓小平担任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以后，开始发展市场经济，并制定了对外开放战略。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两代中国领导人的外交实现了从“革命外交”到“建设外交”的转型（王存刚 2012）。随后，江泽民和胡锦涛继承发扬了这些外交政策，并先后提出了新安全观、和平发展道路与和谐世界等新理念。相关学者把中国在1949-1979年称为中国1.0版革命外交、1979-2009年称为中国2.0版发展外交（这两个阶段是“韬光养晦”阶段），而把习近平同志就任国家最高领导人后出台的一系列外交倡议和理念，并逐渐形成的外交政策称为3.0版中国外交（赵可金 2013）。相对此前的“韬光养晦”阶段而言，此阶段里“奋发有为”是中国外交的主基调，因此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下的3.0版外交也被称为奋发有为外交。习近平在2013年10月举行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为中国发展争取良好的周边环境，使中国发展更多惠及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3）。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政府提出了如“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亚洲安全观”、“底线思维”、“新型大国关系”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等一系列的外交倡议和理念。

在3.0版的中国外交政策进入2017年以后，继续出现了新的发展。首先是在2017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上，强调了要认真落实“亲诚惠

容”理念和“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并把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的“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其次是在2018年3月的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在《宪法》的序言里增加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开放战略”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新华社 2017）。以上这些外交政策调整，是在当前外交环境变化下，以《党章》和《宪法》的形式来巩固提高习式外交的历史地位，并继续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联合周边外交方针来推动同周边国家的共同发展。尤其是2018年的十三届人代会上修改《宪法》的做法是在1982年宪法公布施行后，首次对宪法中关于外交政策方面的内容进行补充（人民日报 2018）。这两次调整给3.0版中国外交政策勾勒出了新的重点，突出了习近平政府时代外交方针的新特点，具体表现为：体现了将在兼顾欧美的基础上，继续把外交重心转向周边国家；同时中国将更加注重同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联系来推动亚洲的政治经济新体系；最后还体现了在今后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外交发展方向为共同维护和平，推动互利共赢，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

而在中国致力于发展3.0版外交政策的时期，中印关系跌宕起伏，总体来看呈现出高开低走的现象（叶海林 2017）。莫迪政府在第一届任期时的对华政策还具有摇摆的一面，既有矛盾激化的事件发生，又有寻求对华合作的意向：首先是2017年6月18日，印度多名边防人员携带工程机械和枪械越境进入中国境内阻止我方施工人员的公路建设，引发了洞朗事件。其次是从2017年-2019年间，莫迪总理数次和习近平见面，寻求对话和谈判的方式寻求缓解局势。然而在莫迪政府的第二届任期，两国的关系转向恶化。2020年4月，印度不顾中方的多次交涉和抗议，单方面在加勒万河谷地区持续修建道路和桥梁等设施，并于5月6日越线进入中国领土构工设障，阻拦中方边防部队巡逻，蓄意挑起事端并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制造了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中国外交部 2020）。6月15日印方再次越线，暴力攻击中方官兵，引发了流血冲突和人员伤亡。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爆发后，印度继续做出恶化局势的举措，莫迪政府在6月底以国家主权和安全受到威胁（Sovereignty and Security）的理由宣布禁止

59个中国的手机应用程序 (The New York Times 2020)，并在随后又宣布禁止另外47个应用程序，准备禁用250个其它中国应用程序 (India Today 2020)。

表一：莫迪执政期针对中国的攻击性外交措施

序号	时间	莫迪任期	内容
1	2017年6月	第一届	印度官兵越境进入中国, 引发洞朗对峙事件
2	2020年5月	第二届	印度边防部队越境进入中国, 引发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

出处：作者根据实际情况自制。

IV. 印度莫迪政府对中国3.0外交的考验

1. 莫迪政府挑动边境冲突的动机分析

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党在20世纪90年代依靠鼓动“重建罗摩神庙运动”扩大了在印度教族群的影响力，并与国大党成为政坛的两大主要政党。莫迪上台后采取了一系列推动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潮的激进政策，致力于把印度教民族主义变成印度的主流意识形态。印度人民党则在莫迪执政期间在各地将带有伊斯兰寓意的地名改为印度教色彩的新地名，如2018年把阿拉哈巴德改名为普里亚格等；还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控制的邦政府里采取了诸如全面禁止宰杀母牛，组建“反罗密欧小队”，在古吉拉特邦等的地方政府修改历史教材并大量删除有关穆斯林统治者的章节等等 (王世达 2020)。2019年8月5日，莫迪政府通过总统令废除了宪法第370条规定，取消了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治地位，同时议会还通过了将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划分为两个中央直属地的议案。2019年12月12日，印度通过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政府可以据此有条件授予2015年前从阿富汗、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抵达印度的“受迫害”的印度教徒、拜火教徒、锡克教徒

等以印度公民身份，但是穆斯林被排除在外。该法案引发了印度各地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并演变成全国性的骚乱，导致数十人死亡。莫迪还于2020年8月5日前往阿约提亚并主持了‘Hoomi Pujan’仪式，这代表着正式开始建设罗摩神庙，罗摩神庙将建在巴布里清真寺的原址之上。莫迪政府的这一系列激进政策，使得印度教族群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印度的一些媒体表示宗教政治运动达到高潮，将决定性地改变国家政治，加剧社区关系的紧张；莫迪将印度人民党推上了首发位置，同时将印度教意识形态推向中心（Times of India 2020）。

莫迪政府正是对内采取了一系列印度教族群利益的政策而让他取得了印度教族群的支持。而宗教民族主义激化的结果是造成宗教民族矛盾激化，对立和分离情绪严重。莫迪逼出了其它族群对于政府和印度教族群的愤怒，引发了一系列的示威甚至暴力事件，印度教族群和穆斯林族群、锡克教族群等其它族群的宗教民族主义情绪由此已经暴涨到了极为危险的程度。这迫使莫迪政府必须采取手段来减缓或者转移国内的民族主义能量，否则将对印度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莫迪采用了对周边国家挑起事端，借此来分散国内民族主义分子视线的手段。其中，巴基斯坦作为一直以来和印度不和的国家，成为首当其冲的攻击对象，印度曾越过印巴控制线打击武装分子并取消克什米尔自治，引发了巴基斯坦的剧烈反应。而中国则成为新的攻击对象，莫迪政府为了转移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惜打破20世纪60年代以来两国边境的安宁。莫迪政府这种攻击性外交手段，对于进入3.0外交政策时代的中国来讲，是一个严峻考验。

2. 中国在中印边境冲突的3.0外交政策实践

在莫迪执政期间对中印关系影响比较大，造成后果最为严重的，是洞朗事件和加勒万河谷冲突。因此本文把两次边境冲突事件作为时间节点，分别分析在这三个阶段--洞朗事件阶段、中间阶段和加勒万河谷冲突三个阶段里，中国是如何把3.0外交政策运用到对印关系上的。

首先，在洞朗事件上，中国高度克制，据理忍让，自始至终采取和平外

交手段来解决事件，表现出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原则和“亲诚惠容、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理念。2017年6月16日，中方在洞朗地区进行道路施工。6月18日，印度边防部队270余人携带武器，连同2台推土机，在多卡拉山口越过锡金段边界线100多米，进入中国境内阻挠中方的修路活动，引发局势紧张。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并没有采取军事手段进行反制，而是在6月19日首先通过外交途径紧急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对印方非法越界行为予以强烈抗议和谴责，并要求印方立即将越界边防部队撤回印度一侧。随后中国外交部、国防部、中国驻印度使馆在北京和新德里先后多次向印度提出严正交涉，强烈要求印度尊重中国的领土主权，立即撤回越界的边防部队。于此同时，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发言人多次公开表态，向国际社会说明事实真相，表明中方立场，并公布了印军越界的地图和现场照片。中国有理有据地向国际社会明确证实，长期以来，中印两国按1890年条约确定的边界线实施管辖，对于边界线的具体走向没有异议。

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越过中印锡金段边界进入了中国领土，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此次事件发生在中国境内，与过去双方边防部队在未定界地区发生的摩擦有着本质区别。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道路施工，完全正当合法（新华社 2017）。印度方指责的中国的修路活动没有越过边界线，并且提前通报了印度，最大限度体现了善意。印度非法越境，违反了1890年条约，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按照联合国的相关规定，中国是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来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是有据可依，合理合法的。但是在印度越境挑起事件后，中国本着“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理念，并没有采取同步的军事行动。通过外交途径进行交涉，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中国在试图用较低的代价来尽力挽回事态，使得事件不要往更为严重的方向倾斜。和平来之不易，各国都需要珍惜，中印两国都需要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克制，据理还忍让，体现出了大国风范，这使得中国在国际社会理不亏词不穷。然而，在事件发生十天后，印度仍然没有撤回到印度境内，印度陆军参谋长拉瓦特表示印度在为“2.5线战争”做准备来应对威胁（国防部网 2017）。面临印度的毫不悔改，此时中国国防部举行记者会，表示解放军新型坦克在西藏试验；7月4日

又公布了西藏军区某旅开赴陌生地域环境实弹演习的报道，以此来对印度的好战分子发出严正警告。可以看出，中国在印度威胁要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的背景下，也适当地“亮剑”，表示中国“不愿打，但也不怕打”，警告不要低估中国捍卫国家主权领土的决心和维护正当合法权益的意志。此后，中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和印度进行交涉，同时继续争取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8月2日，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越界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文件，向国际社会进一步说明此次印军越界事件的事实真相，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立场。终于在8月28日，印度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印方，并得到了中方现场人员的确认，洞朗事件到此结束。在洞朗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并没有因为实力优势，占据道德高点，且维护领土完整合理合法就对印度采取强硬的措施，而是保持了高度的克制，通过外交渠道来和印度沟通解决事件。这表明中国在印度犯下错误的时候，还是以重视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为重，致力于边境地区的和平。中国在此期间表现出来的克制和忍让，是对3.0外交政策里“亲诚惠容、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理念的良好体现，也是坚持贯彻“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良好体现。

其次，在洞朗事件后，中国频繁开展和印度的首脑互动，努力打造两国“互利共赢开放”良好态势，争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9月5日，习近平在厦门会见来华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印度总理莫迪，强调一个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也是本地区和国际社会共同期待。中印两国要坚持双方互为发展机遇、互不构成威胁的基本判断。希望印方能够正确、理性看待中国发展。要向世界表明，和平相处、合作共赢是中印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双方应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维护好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新华社2017）。2018年4月，习近平又在武汉和莫迪进行非正式会晤，习近平提出一个良好的中印关系是维护世界稳定的重要积极因素，对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意义重大。在发展振兴的道路上，中印两国面临着相似的任务。

中印关系要稳定、要发展，基础是互信。要从战略上把握中印关系，不断增进彼此了解和信任，推动两国各界和两国人民加深相互理解、培育友

好感情(新华社 2018)。2019年10月,习近平应邀前往印度金奈出席中印领导人第二次非正式会晤,会见了莫迪总理,并就国际和地区形势以及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沟通(新华社 2019)。2019年11月,习近平又在巴西利亚和莫迪见面,并提出共同扩大贸易和投资规模,共同办好中印建交70周年活动,促进民间友好。并强调要增进政治互信,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引领两国关系更好更稳向前发展(新华社 2019)。从上可以看出,中印两国首脑在三年间4次见面,并不是常见的事情,这体现了双方对于两国关系都非常重视。对印度而言,莫迪政府的对华外交具有强烈的摇摆性质,中印在局部的矛盾激化尽管可以转移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但是保持和中国的良好关系符合印度的根本利益。中印两国的合作不仅体现在两国间的经贸往来,而且还体现在国际事务合作方面。如莫迪结束洞朗事件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莫迪需要去厦门参加2017年9月初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在此之前两国还没有结束事件,那么将给立志打造“有声有色”大国的印度带来极为不利的国际影响。

印度如果想要在国际社会打造属于自己的威望和信用,就必须积极融入国际上众多的组织机构,并学会和重要邻国之中国保持适当的友好关系。从国际局势而言,特朗普美国政府掀起了一股反自由贸易和反全球化的逆流,这增加了中印两国所面临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两国都需要稳定周边外交,同时坚持互利共赢开放。在西方世界试图改变国际秩序,并以此来打压发展中国家的时候,合作基础还不甚牢固的中印两国更加需要加强沟通,管控分歧。而对中国而言,尽管印度一手制造了洞朗事件,给两国关系带来了裂痕,但是中国还是期盼能够和印度向前看,希望能够和印度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尤其在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中国期待印度能够共筑互信,加强战略沟通,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合作,共同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国愿意和印度成为好邻居、好伙伴。中国的3.0版外交政策里,周边外交是外交的优先方向,中国领导人在十八大以来,几乎访问了所有周边国家,并邀请了几乎所有的周边领导人来访中国(光明日报 2018),高层之间的频繁交往是3.0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要实现“奋发有为”,就要积极开展外交实践,尤其是在中印关系出现重大事件

时，中国需要更为主动地开展外交实践，积极推动中印两国的首脑互动，向莫迪表明中国的“亲诚惠容”。因此，在中国的不懈努力下，中印两国因洞朗事件造成的裂痕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两国关系没有因洞朗事件而陷入低谷。

最后，在加勒万河谷冲突时期，中国坚持“底线思维”，对于挑衅展开果断正当还击，同时“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让事态影响“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的一贯性。加勒万河谷冲突是中印两国自196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流血冲突，也是1975年以来第一次有军人在两国边境摩擦中死亡（*海外网* 2018），造成了印度死亡20名军人以及中国部分军人伤亡。2020年4月，印度边防部队单方面在加勒万河谷地区持续抵边修建道路、桥梁等设施。2020年5月6日凌晨，印度边防部队趁夜色在加勒万河谷地区越线进入中国领土、构工设障，并阻拦中方边防部队正常巡逻，蓄意挑起事端，试图单方面改变边境管控现状。中方边防部队不得不采取必要措施，加强现场应对和边境地区管控。此后为缓和边境地区局势，中印双方通过军事和外交渠道进行了沟通。在中方强烈要求下，印方同意并撤出越线人员，拆除越线设施。6月6日，两国边防部队举行军长级会晤，就缓和边境地区局势达成了共识。印方承诺不越过加勒万河口巡逻和修建设施，双方通过现地指挥官会晤商定分批撤军事宜。然而在2020年6月15日晚，印军在加勒万河谷现地局势已经趋缓情况下，再次跨越实控线非法活动，蓄意发动挑衅，甚至暴力攻击中方前往现地交涉的官兵，进而升级为双方激烈的肢体冲突，造成人员伤亡。面对印度军方跨境挑衅导致冲突，中方向印方提出了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6月17日，王毅外长要求印度开展彻查，停止挑衅，并尽快召开军长级会晤，尽快实现局势降温（*外交部网* 2020）。到8月份，中印双方共举行了6轮会谈，双方的一线部队大部分已经脱离接触（*凤凰网视频* 2020）。不过加勒万河谷冲突还没有解除，还存在着各种变化可能。对于本次事件及其发酵，中国自始至终并未进入印度境内，这一点也得到了印度总理莫迪的亲自承认，中国由此始终占据道德高点。而在印度军方进入中国境内后，蓄意发动挑衅攻击，才引发了冲突，造成伤亡（*India Times* 2020）。然而在印度境内，莫迪政府继续做出

恶化两国关系的举措，莫迪在6月底宣布禁止59个中国的手机应用程序，并于7月底宣布禁止另外47个应用程序，并准备禁用250个其它的中国应用程序，此举使得印度境内的抵制中国情绪上升，国家民族主义思潮旺盛。中方外交部对此表示强烈关注，认为印度政府有责任根据市场原则来维护包括中国企业在内国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外交部 2020）。通过本次事件的回顾可以看出，中国坚持了“底线思维”外交方式，一方面不主动越境挑起冲突，另一方面在对方越过底线，使得中方受到攻击时坚决反击。同时，中国和印度进行外交沟通的渠道一直敞开，王毅外长和印度外长数次通话，力求通过对话协商的方式来寻求突破；中印双方一共举行了六次军长级别的军方会谈，希望通过谈判来管控紧张局势、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里，仍旧保持了极大的耐心，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一贯外交方针。而印度方面，莫迪政府在冲突发生后并没有处理好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而是采取动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来继续推动国家民族主义思潮，开启了全国性“抵制中国”的运动，激化了印度全国性反华意识形态。此举尽管为自己在国内推广印度教民族主义带来了喘气的机会，但是却使得中印两国陷入“脱钩”的危险之中，有可能从根本上撼动了两国的合作根基，从长期来看将对中印两国的关系造成深远的影响。在此背景下，中国并没有仿效印度做出推动类似于“抵制印度”的民族主义思潮，而是相对保持平静。究其原因是中国知道坚持亲诚惠容理念的重要性，中国正处在和平崛起的关键阶段，如果采取对等方式对印度进行还击，尽管能够图得一时痛快，但将使得中国多年以来和周边国家共同打造的“和平红利”瞬间化为乌有，也可能使得其它周边国家因此认为中国的周边外交理念不可相信，动摇他们对中国“和平崛起大国”的信心。当前中国面临着来自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新冠疫情方面的“甩锅”，和在科技战争领域的“脱钩”；而在在中印关系方面，加勒万河谷冲突还没有结束，中国又面临印度莫迪政府的边境冲突和全国性抵制。中国尽管已经表现出了极大的容忍度和耐心，但是还需要始终坚持3.0版外交政策核心理念，才能使得事态妥善解决。

V. 结论

跟此前1.0版的革命外交和2.0版的建设外交相比，中国的3.0版外交政策因为具有较为明显的奋发有为特征而被学者们称作奋发有为外交。在3.0版外交政策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亚洲安全观”、“底线思维”、“新型大国关系”和“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等一系列关键词都是重要的外交倡议和理念。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中，中印关系显得非常重要，也非常特殊。做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两国在众多领域拥有着非常的合作前景，但是却由于历史记忆、边境问题等多重原因，一直以来两国关系跌宕起伏，而在2013年以后呈现出高开低走的态势。莫迪政府分别在第一届和第二届任期内，先是于2017年越境中国制造了洞朗事件，后又于2020年越线进入加勒万河谷的中国境内引发了流血冲突和人员伤亡。这是中印两国自1962年以来最为严重的边境冲突，中印两国关系由此可能陷入长期的对立和排斥局面，而印度还在莫迪政府的政策引导下爆发了抵制中国的全国性民族主义思潮。在当前的全球性新冠疫情下，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疫情甩锅”，并和一些盟国联合起来推动和中国的科技“脱钩”，而印度莫迪政府的所作所为更是对中国开展周边外交形成重要阻力。当前风云突变的国际社会环境对于中国的3.0版外交政策而言，是一个重大考验。

本文研究了中国的3.0外交政策在对印关系方面的外交实践，并把此期间的中印关系可以大致以两次事件为节点分为三个时期。在洞朗事件上，中国保持了高度克制，据理还忍让，自始至终采取了和平的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表现出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原则和“亲诚惠容、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理念；在洞朗事件后，中国频繁和印度的首脑进行了互动，努力打造两国“互利共赢开放”良好态势，争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在加勒万河谷冲突时期，中国坚持“底线思维”，对于挑衅进行果断正当还击，同时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让事态影响“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的一贯性。本

文认为在已经对中国进行抵制和对立态度的印度面前，中国全面展现出了理性、克制和包容的一面，“底线思维”、“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亲诚惠容”等理念体现的淋漓尽致，证明3.0版中国外交政策对周边国家而言是利好的，是务实的、负责任的外交政策。在疫情仍然肆虐全球的情况下，受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亲诚惠容”等理念支撑的中国3.0版外交政策将继续展开，使周边国家受惠。而对韩国而言，中国的3.0外交政策将持续为东北亚的和平发展局势提供重要背景支撑；而在两国关系方面，两国在疫情初期就开展了公共卫生外交，在疫情得到控制后两国还率先在全球首先建立“绿色通道”；此后中国的高级官员杨洁篪还专访韩国，并把韩国定为习近平在疫情稳定后优先考虑访问的国家，在2020年内习近平访韩事宜因疫情受阻时，还专派外交部长王毅访韩说明情况。这些都表明在3.0版外交政策的背景下，中韩两国将保持良好沟通，并有望在新时期实现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值得期待。

<参考文献>

- 林民旺. 2016. 《寻求一带一路建设下的中印发展对接》，印度洋经济体研究，第3期，第一页。
- 王存刚. 2012. 《论中国外交调整—基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第11期，第120-126页。
- 王红续. 2011. 《新中国外交的价值取向与战略抉择》，国际关系学院学报，第6期，第9页。
- 王世达. 2020. 《印度教民族主义强势崛起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第2期，第33页。
- 王晓文. 2017. 《印度莫迪政府的大国战略评析》，现代国际关系，第5期，第33页。
- 文富德. 徐菲. 2016. 《试论印度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和作用》，南亚研究，第3期，第106页。
- 杨思灵. 2012. 《试析印度加强与亚太国家战略合作及其影响》，南亚研究，第1期，第1页。
- 叶海林. 2017. 《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研究》，当代亚太，第6期，第27页。
- 俞正探. 2007. 《美国扩展对冲战略》，国际观察，第6期，第7页。
- 张立. 2012. 《印度东向战略：进展、影响及应对》，南亚研究季刊，第1期，第14页。
- 赵江林. 2013. 《对当前中印经济关系的评估》，南亚研究，第4期，第1页。
- 赵可金. 2013. 《中国外交3.0版：十八大后的中国外交新走向》，社会科学，第7期，第4页。
- Toje, Asle. 2018. “Will China’s rise be peaceful? Security, stability, and legitima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astells, Manuel. 2010.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Oxford: Wiley Blackwell.
- Allison, Graham. 2017.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Boston- New York.

Souva, Mark. 2017. "Power Shifts and War."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J. Smith, Steven. 2012. "Engage But Hedg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Practice." Air University.

Kang, Genhyong and Kang, Byeongcheol. 2016. "Changes in U.S.-China Relations and Korea's Response." *New Asia*, vol. 23, no. 2, pp. 83-111.

Lee, Jaebong. 2014. "The Change of U.S.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South Korea's Neutral Diplomacy." *The Korean Association of Northeast Area Studies*, vol. 70, pp. 5-19.

Lee, Soohyung. 2011. "Axis Middle Power and Korea's New Diplomatic Security Strategy Exploration." Korea peace research academic conference, No.4, 2011, p1.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2013. "中国周边外交新境界."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3/1104/c40531-23425165.html> (上网时间: 2018/03/20).

国防部网. 2017. "希望印军个别人汲取历史教训, 停止叫嚣战争." 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7-06/29/c_129643875.htm (上网时间: 2020年8月2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2017. "印度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锡金段进入中国领土的事实和中国的立场." http://www.gov.cn/xinwen/2017-08/02/content_5215586.htm (上网时间: 2020/08/21).

新华社. 2017.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09/05/c_1121609181.htm (上网时间: 上网时间: 2020/08/22).

新华社. 2017.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上网时间: 2020/08/01).

新华社. 2018.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http://www.xinhuanet.com/2018-03/11/c_1122521235.htm (上网时间: 2020/08/01).

人民日报. 2018.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8-03/14/nw.D110>

- 000renmrb_20180314_1-15.htm (上网时间: 2018/03/14).
- 新华网. 2018. “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在武汉举行非正式会晤.”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4/28/c_1122759716.htm (上网时间: 2020/08/22).
- 光明日报. 2018 “中国特色周边外交奋发有为.” http://www.qstheory.cn/zdwz/2018-06/22/c_1123018807.htm (上网时间: 2020/08/24).
- 新华社. 2019.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http://www.gov.cn/xinwen/2019-10/12/content_5438653.htm (上网时间: 2020/08/22).
- 新华网. 2019.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莫迪.”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9-11/14/c_1125228993.htm (上网时间: 2020/08/22).
- 外交部. 2020.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789468.shtml (上网时间: 2020/08/24).
- 新浪网. 2020. “中印爆发严重军人肢体冲突! 印度须走出局势误判.” <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20-06-17/doc-iircuyvi8883839.shtml> (上网时间: 2020/08/24).
- 外交部. 2020.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790422.shtml (上网时间: 2020/08/24).
- 外交部. 2020. “2020年6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https://www.fmprc.gov.cn/web/fyrbt_673021/jzhsl_673025/t1790422.shtml (上网时间: 2020/07/29; 2020/08/24).
- 凤凰网视频. 2020. “印媒: 中印第六轮军长级会谈举行, 双方一线部队大部分脱离接触.” <http://ent.ifeng.com/c/7ymvZv7RppY> (上网时间: 2020/08/24).
- Maria Abi-Habib. 2020. “India Bans Nearly 60 Chinese Apps, Including TikTok and WeChat.” *The New York Times*,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29/world/asia/tik-tok-banned-india-china.html> (Browsing date: 2020/08/12).
- Mike Segar. 2020. “Geopolitical Power Shifts.” *World Economic Forum*, <https://reports.weforum.org/global-risks-2018/geopolitical-powershift/> (Browsing date: 2020/08/04).

Rahul Shrivastava, Kamaljit Kaur Sandhu. 2020. "India bans 47 Chinese apps; over 250 more under scanner for user privacy violation." *India Today*, <https://www.indiatoday.in/india/story/pubg-alibaba-xiaomi-to-be-banned-india-prepares-list-of-over-250-chinese-apps-1704814-2020-07-27> (Browsing date: 2020/08/12).

Sweta Dutta. 2020. "PM Narendra Modi: China did not enter our territory, no posts captured." *India Times*, <https://mumbaimirror.indiatimes.com/news/india/pm-narendra-modi-china-did-not-enter-our-territory-no-posts-captured/articleshow/76471096.cms> (Browsing date: 2020/08/24).

Times of India. 2020. "Back in Ayodhya after 29 years, PM Modi to lay first Ram temple brick today."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india/back-in-ayodhya-after-29-years-pm-modi-to-lay-first-ram-temple-brick-today/articleshow/77361116.cms> (Browsing date: 2020/08/06) .

투고일 : 2021년 4월 26일 . 심사일 : 2021년 5월 24일 . 게재확정일 : 2021년 6월 2일

* Bo Tu is the profess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illa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at Kunming Institute for Advanced Information Studies,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Belt and Road".

<Abstract>

China 3.0 Version Foreign Policy's Practical Use Towards India

Bo Tu

(Silla University)

After entering the era of Xi Jinping administration, China's 3.0 version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veloping in practice. Especially since 2017, China's 3.0 version foreign policy continued to have new changes as follows: First, it emphasized the "Foreign Policy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pu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to the Communist Party Constitution. Second, added "Adhering to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Adhering to the Win-Win Strategy of Opening up" and "Promoting the Building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o China Constitution. Other than that, "New Concept of Asia Security" and "Bottom-line Thinking" also gradually are implemented in China's diplomatic practice. In the volatil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re have been upstreams against globalization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of which Modi administration is one example. Modi pushed for Hindu nationalism, which not only set off drastically religious nationalism trend in the domestic, but also led to spillover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Indian military respectively crossed the border into China and caused the Dong Lang Issue and the Galvan Valley Conflict. These issues seriously affecte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challeng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a 3.0 version foreign policy. This paper focuses on how the

important concepts in the 3.0 foreign policy were applied to the diplomatic practice against India, and how China avoided the escalation of the situation. From the paper, we can find that China maintained a high degree of restraint and insisted on solving the problem through negotiation and consultation in the Dong Lang Issue. In the interlude between the two issues, China actively promot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wo leaders and sought to build a momentum of peace and mutual benefit. In the Galvan Valley Conflict period, China stuck to the “Bottom-line Thinking” at well as adhered to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China in the future will still need to adhere to these 3.0 version foreign concepts-- “the Great Power Relations”, “Bottom-line Thinking” and “Amity, Sincerity, Mutual Benefit and Inclusiveness in Chin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China will safeguard its core interests and maintain a good foreign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pea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Keywords : China, 3.0 version foreign policy, India, Practical Use, Modi Administration